

教学参考资料

目 录

- 一、刘少奇同志的讲话（1962年1月24日）（1）
- 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1962年2月6日）（33）
- 三、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1962年
1月26日）（57）
- 四、周恩来同志的讲话（1962年2月7日）（66）

刘少奇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国际形势(略)

二、国内形势: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付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够。就是说,人民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

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如山东的惠民、德州。但是山东其他地区的情况就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个省委、某个地委、县委是怎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毛主席插话：加三、四条都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那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地、县，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的工业交通建设有很大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成绩，我们在政治、思想、商业、文教、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书面报告上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 and

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说什么不能到处这样套。在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毛主席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了，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许多缺点、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作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跤的，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那一个人走路不跌过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倾箱倒篋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也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样的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和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需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而是在执行中的问题，就是说在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是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面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进行若干次的反复，方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八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负责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主席：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和口号。

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呢？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中，自己

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的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方面来了，我们对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中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限期完成。这就是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到很

大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它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在几年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我们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几年工作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的饭（主席：已有不少人害过浮肿病）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明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现在我们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

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犯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总结。因为这些事情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不可能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的更好。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不是只是他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看来，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实事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过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也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一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主席、总理：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主席：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除了在庐山会议上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

后活动。他们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对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在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自己早就讲过的，而彭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彭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得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开展那一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区别开来，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样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主席：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其次讲一讲三面红旗的问题：

总路线问题，我们过去说，我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不是说它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实行这条总路线。但是这几年在总路

线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不注意好省，或者注意得不够。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品种、质量上面跃进。我们要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要单纯地追求数量。今后数量不一定要增加很多，要更多地注意品种、质量、注意配套，使我们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能够自力更生，这件事的重要性，英国人懂得，日本人也懂得。我和我们驻英国代办宦乡同志谈过话，他说：“英国人怕我们怕得厉害，对中国很恐慌，说我们发展得惊人的快”。我说：“现在我们停下来了，他们该不怕了吧”！他说：“我们停下来，他们更怕”。为什么英国人更怕中国人呢？因为他们懂得单靠数量不行，品种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他们怕我们把品种质量搞上去。一个日本人跑到鞍钢看了一次，也提出了重视品种质量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确定的总路线，完整地说，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总路线，难道是不正确的吗？难道全国人民不要团结起来，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吗？绝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说，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我们许多同志在执行总路线的时候，没有注意使全国人民真正自觉地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鼓足干劲，不是由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去力争上游，而只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只注意多快，而不是同时注意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们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是在执行总路线工作中发生了偏差。我们只要纠正这些偏差，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总路线，就会是很好的。

大跃进问题。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翻，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对大跃进的正确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毛主席说过：苏联从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到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这二十一年的时间中，他们的钢产量，从沙皇时代原有的四百二十万吨的底子，增长到一千八百二十万吨，也就是说，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二十一年中，钢产量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一年的时间，使我国的钢产量的增加，比一千四百万吨更多一些呢？比如增加一千五百万吨，一千六百万吨，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一千九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如果可以，我们的发展，就不但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一些，而且也比苏联快一些（主席：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还是达不到，因为我们的底子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不能增加这么多，不能增加一千八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总理：我们讲二十一年是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一九七〇年，底子薄有两种可能性，主席：底子只有九十万吨），也许我们只能增加一千四百万吨，或者还少于一千四百万吨，那我们就没有大跃进。毛主席在几年前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可以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比较快一点好一点，用那种方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比较慢一点差一点，我们是不是可能实行一种比苏联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呢？（主席：现在还没有证明）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不是可以争取呢？我们说，是可以争取的，可以试一试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争取到了，就是大跃进。当然，如果争取不到，那就证明没有大跃进。因此，大跃进

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还应该坚持下去。

人民公社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一大二公”的特点，从现在人民公社来看，就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因此，有人就问：这个“一大二公”还要不要？我们说这个口号用不着取消，还是用一下，过若干年再看。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一方面，它可以自办一些企业来增加积累，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抽取一些公积金，将来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人民公社有一点“一大二公”，兴修了许多已经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有一些社办企业，也作了一些事情，但是作用不很大，“一大二公”还不大明显，还看不大清楚。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所以人民公社要继续办，“一大二公”的口号也要保留，将来再看。

书面报告上说，人民公社吸收了初级和高级社的优点，这句话怎样解释，吸收了初级社的什么优点呢？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小队，即生产队，大体上就是以前初级社的规模。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说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实行记工评分，土地没有报酬，对五保户、困难户有补助等等，从这些方面说，初级社的优点我们有了，高级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的优点。能搞多少优点就搞多少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也搞不成。

我们吸收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本身的优点，来建立和发展现在的人民公社。这样做，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现在一般不搞了。原来我们也说，供给制起一种社会保险作用。现在对五保户、困难户的照顾，也就是一种社会保险，这个还保留。我们曾经普遍办过公共食堂，这是不正确的，现在不办了，但是自愿结合的农忙食堂，是可以办的应该办的。

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是可以的，问题已经办起来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反对它呢？还是赞成并加以领导逐步把它办好呢？我们说，还是应该赞成它，逐步把它办好。

还有的同志说，如果人民公社一开始，就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不是更好吗？是的，那是更好，但是做不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那时就没有这样的聪明，那时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有区别地、分期分批逐步推广，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样，就会比较好些。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出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搞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前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论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它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物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是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

“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作那个括弧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冒失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括弧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经常真正的干劲，他会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是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之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八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问题上去，对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问题上去。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正确的消息，就轰起来了。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我们要有朝气蓬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区别、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

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主席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作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致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来推广和造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它地方也许又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主席：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那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